

# 现代人文学术的建设路向与规模

胡逢祥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上海 100062)

**摘要:** 清末以来,我国的人文学术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向现代的曲折转型。期间,围绕着学术现代化的主题,各种理念或主张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至今余响不绝。本文主旨,在通过这一历史过程,特别是现代史学建设态势的梳理分析,对其转型轨迹与运作实践之得失和特点有所揭示,以为推进当代人文学术的发展及其制度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传统与现代 人文学术 科学化 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 传统与现代学术之分野

在整个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大趋势中,作为精英文化的人文学术变革,似乎常处于一种相对滞后的状态。尽管传统学术自清中叶以后已显露出种种疲态,但在很长时期内,其所经历的“今文学”复兴或“汉宋调和”等流变,就性质而言,仍属自身内部的调节,而非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新生。直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随着国内新知识群体的崛起,现代学术的建设才开始步入了一个自觉的过程。

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非止一端,而国人对此问题认识上的滞后,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自鸦片战后,有识之士目睹国势积弱不振,纷谋御侮之策。然其初数十年,由于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积蕴深厚所形成的历史惰性,以及长期闭关自守导致对外部世界的茫然无知,使一般人依然不免沉浸于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中难以自拔。其时朝野所注目者,莫非练兵、制器、开矿、通商、科技和某些制度法令层面的变革,对于传统学术面临的整体危机,则往往缺乏清醒的认识。即如沈垚、龚自珍、魏源这样一些对当时社会现实持强烈批判姿态的学者,论及学术,亦不过是重倡“经世”学风,以求振厉末俗和起衰致强,而非对其内涵之更新。其后洋务派的眼界,虽说更趋开阔,然于文化,大抵犹抱定“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必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sup>[1]</sup>的宗旨不改。及至上述观念和实践屡遭挫败,才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有精神而后有物质,有理论然后有事实,有学术然后有政治。今日西洋各国之格致学、哲学、政法学、生计学种种发达之象,至于此极者,皆由前此数十辈巨儒硕子之学说来也……中国学术,常屈于一尊之下,有保守而无发生,故凡百濡滞,皆无进步。国无进步,焉得不败?”可见“居今日而言救国,其必一国之国民人人自励,人人自兢,先使一身之学术无一年、无一月、无一日、无一时而不可有其进步……举国国民之学术既进,然后群起而谋其国,使一国之政事亦无一年、无一月、无一日、无一时而不可有其进步”,方得致国家于富强。<sup>[2] (P248-249)</sup>由此,人文学术的变革始在更为宽广的现代化视野下受到了社会的关注。

而围绕着传统学术如何向现代转型的问题,学术界同样经历了一个颇为曲折的认识过程。

从思想史演变的脉络看,中国学人对传统与现代学术的分野意识,最初实起自中西文化的比较。按照旧时的观念,中国学术自禹汤文武周孔以来,始终道统相承,从未有过足与

之相颉颃的另一学理系统，故在一般人心目中，自然也从无此学之外的“现代学术”概念。但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趋势，却使人看到了另一种与“中学”全然不同的异邦强势文化，于是“中学”与“西学”之对等概念乃应运而生。应当说，中、西学的对举，其初原无明显的轩轻之意，而只是表述了两种文化的不同来源和内容特征。且当时所谓“西学”，大多数人的理解，仍不出“西技”（包括自然科学）的范围，认为“以西学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sup>[3] (P49)</sup>论及中、西之学，亦多倾向在强调“中学”特别是其人文方面整体优势的前提下，肯定两者互有所长，如谓“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夔然出于万国之上，莫能及也。”<sup>[4] (P183)</sup>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大僚固然如此，冯桂芬和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派也难免有这样的倾向。

甲午战后，这种局面渐被打破。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在人们的心目中，“西学”的地位迅速上升，洋务运动以来勉强维系的“中学”权威更趋摇落。其时知识界对“西学”内涵的认识也较前大为扩展，如梁启超1896年所作的《西学书目表》，不仅列举了算、重、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书目，还包括了大量史志、官制、学制、法律等人文社会政治学说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以“旧学”和“新学”的来区分中、西学的情况。这在一些外国来华传教士发表的文字中尤为常见。如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在《文学兴国策序》（1896）中称：“中国之人，无不知旧学之不足与新学之当兴矣。日本崇尚新学，其兴也勃焉；中国拘守旧学，其滞也久矣。诚使当世主持学校之人均奉是编以为圭臬，当愈晓然于旧学之不足与新学之可兴矣……今中国如欲变弱为强，当先变旧为新。振兴新学之初，速当选派国中强壮循良子弟出洋学习。”<sup>[5] (P263)</sup>李佳白（Gilbert Reid, 1857-1927）的《中国宜广新学以辅旧学说》等也有类似的言论，由传教士建立的出版机构“广学会”还打出了“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sup>[6]</sup>的旗号。他们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淡化西学作为外来文化的色彩，使之更易为中国人接纳；另一方面，显然也包含着张扬西学现实价值的用意。值得注意的是，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内提到中、西学时，同样采纳了这组概念，主张“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sup>[1]</sup>不过理论上强调的依然是“中学”的主体优势。但到二十世纪初年，随着思想界越来越多的人以旧、新学的概念指称中、西学，其内涵已多表露出褒扬西学和贬斥中学的价值取向，以致出现了一股“理则尚新理，学则尚新学，欲国之强也则曰‘新国’，欲民之智也则曰‘新民’”<sup>[7] (P852)</sup>的趋新风气。不少人直斥秦汉以来，我国“学术思想日趋于空漠，至宋明而益甚。物质的文明无复可言”，今唯“效法西人，一变旧制，为转亡为存之至计”。<sup>[8]</sup>有的则声言：“今泰西之各科学术何一不长于我，况日新而月不同，学术之进步超前而轶古”，“故吾人当以无学为可耻，不当以变夷为可耻。”<sup>[9]</sup>这里，无论是中、西学还是新、旧学的概称，实际上都已包含了一种判别事物进步与守旧的价值尺度。

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新旧思潮大激战的展开，不少人更将中、西学和新、旧学的概念使用完全等同起来，并明确赋予其不同时代的含义。他们强调：“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sup>[10]</sup>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从性质上说，“未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sup>[11]</sup>有的还径称当时的西方文化为“现代文明”或“现代科学”。<sup>[12]</sup>这样，中西、新旧之学的特定文化指向，便由最初空间上的区别演化为一种时代性的差异，亦即具备了传统与现代学术分野的实际内涵。只是从语义学的角度看，这两组概念因受其文字原意的局限，都难以准确地传达传统与现代的全部含义，以致争议屡起。故三十年代以后，围绕着“现代化问题”的讨论<sup>[13] (P356)</sup>，学术界遂有人使用“现代学术”的概称，来作为传统学术的对应语，以求更为正确地界定其间的分野。

正是这样一种外来因素引发的“现代”意识，使中国的人文学术现代化一开始就带有极为明显的“西化”色彩。这一点，从二十世纪初整个学术风气的变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时不少新知识分子都痛感旧学界“受保守主义之烈毒，服从古人以外不敢有思想”之弊，以为“非灌输路索（卢梭）、孟德斯鸠、达尔文、斯宾塞诸儒之学说以淘洗之，茫茫大陆将随学界长沦于黑暗之中矣”。<sup>[14] (P458)</sup>因而群起以输入西学为救国第一要务；而人文学界扬起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史界革命等旗号，也无不以效法西方为根本宗旨；激烈点的，甚至主张废灭汉文而代之以“万国新语”。<sup>[15] (P209-214)</sup>即使是提倡“保存国学”和反对“颂言西方而武模其仪”的国粹派中人物，亦不免时常流露出以西方现代价值观为座标的文化取向。他们不仅用《尚书》和《周礼》所载古代国君“询及卿士”和“询及庶民”之制比附西方民主，<sup>[16]</sup>以清初顾炎武“乡治说”比附西方近代的地方自治等方式，<sup>[17]</sup>来证明传统文化或制度的价值，其学术研究，也不乏大量吸取西方进化论、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理论的例子。<sup>[18] (P85-89)</sup>至“五四”前后，现代化即“西化”之观念更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站在新文化运动一边的陈独秀等人反复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晰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几及千载”，<sup>[19]</sup>“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sup>[20]</sup>在他们看来，世界各民族和各地文化的发展，走的都是同一路线，就中、西文明的现状看，“西洋文明是在第三期，而中国方面却才从第二期觉醒过来”，故其未来的发展，首先自然是按照西洋的模式，“从古代而超入现代”。<sup>[21]</sup>至于传统学术，即使过去有成就，也属“已死的东西，一来因为他生长终止，二来因为他日就腐败”，<sup>[22]</sup>现在研究它，不过像“解剖尸体”一样，以便“知道中国人从前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所以不很发达的缘故，我们亦就可以知道用什么法子去救济他”。总之，“国故是过去的已死的东西，欧化是正在生长的东西；国故是杂乱无章的零碎智识，欧化是有系统的学术。这两个东西，万万没有对等的道理。”<sup>[22]</sup>与现代学术的建设自然亦无多少关系。

对于这种“现代化”即“西化”的观念，当时学术界就有人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不同民族的生活特性、社会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造成的，因而不能简单地按西方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东方学术的是非进退。同样，中国现代学术的建设也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而应根据自身的传统和特点加以更新，通过“统整吾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统系者则明了之，其间有错出者则修整之。一方面尽力输入西洋之学说，使其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sup>[23]</sup>以便“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sup>[24]</sup>在学术建设的方向上，他们尤其反对割断传承关系的所谓“创新”，指出文化的新旧，向来只是相对而言，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新者早无形孕育于旧者之中，而决非无因突出于旧者之外。盖旧者非他，乃数千年来巨人长德方家艺士之所殚精存积、流传至今者也”。<sup>[25]</sup>故“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融铸之，贯通之。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亦当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sup>[26]</sup>不过，由于持此论调的杜亚泉、章士钊、梁漱溟、吴宓等大多带有较为浓厚的传统文化情结，在新文化运动浪潮激涌的“五四”时代，往往被主流激进人士斥为“保守”落伍者，故其观点中的这点理性成份自然也很难唤起世人的重视。

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人们经过新文化运动以后十余年的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反思，才对现代学术的建设路径有了更为切实的认识。1933年和1935年，学术界先后开展了“中国现代化问题”和“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讨论，特别是后一次，经过多种意见的反复论辩，不仅“本位文化论”的某些保守倾向遭到了批判，也使更多的人看到了“全盘西化论”的理论缺陷，而“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也由此得到了进一步厘清。在讨论中，有人明确指出：“西化”和“现代化”并非一个概念，“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这并不是斤斤于一个无谓的空洞名词，这其中包含着许多性质不同的事实”。大体来说，“西化差不多是抄袭西洋的办法，有的加以变通，有的不加变通”。而现代化则要求“将中

国所有西洋所无的东西，本着现在的智识、经验和需要，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或者是“将西洋所有，但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用的事情，予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并从发展自然科学、促进现代工业、提倡各种现代学术，以及思想方法的科学化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推进现代化的主张，强调只有实现思想方法的科学化，人们的思维行事才能真正做到现代化、效率化和合理化。<sup>[27]</sup>也就是说，它应是一个依据现代中国需要而展开的文化重组和创造过程。显然，这场讨论已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讨论引入了一个如何使之切合国情或“中国化”的理性思考之中。此后，鲁迅等人提出建立“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要求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方向，都将“民族”二字作为其中的要素，实际上都是对这一历史使命作出的理论回应。

与此同时，从学理上看，人们也对传统与现代学术的分野标准逐步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认为其区分度主要在于：（1）主导思想上，传统学术坚守的是经学独断论和道统一元论，“即独尊一家言，视为文明之中心，视为文化之结晶体，视为天经地义，视为国粹，视为国是；有与之立异者，即目为异端邪说，即目为非圣无法……此种学术思想之统一，其为恶异好同之专制，其为学术思想自由发展之障碍，乃现代稍有常识者之公言”。<sup>[28]</sup>而现代学术则主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张扬个性，反对迷信，崇尚理性。（2）在内容与方法上，传统学术知识结构笼统，学科界限不明，且“好古而忽今”，重传承而轻创新，好用直觉而短于抽象思辨，故“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之地位也”。<sup>[29]</sup>其学问亦往往“带一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神秘性，最足为智识扩大之障碍”。<sup>[30]</sup>现代学术则始终以知识范围的扩张与创新为其生命所在，以注重知识的系统、分类细密和精确的逻辑梳理为其方法论特征。（3）在价值功能上，传统学术对旧政治权威多表现出强烈的依附性，在“以文载道”和旧“经世”观的笼罩下，人文学术尤不脱伦理教化色彩。王国维就曾指出：“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文学则“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而现代学术则力求摆脱这种束缚，实现自己独立的社会价值。其所追求的，乃“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所在。如“忘哲学、美术之神圣而以为道德、政治之手段者，正使其著作无价值者也”。<sup>[31]</sup>并一再强调：“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sup>[31]</sup>

我国现代学术的建设，大体上正是沿着上述理论目标而展开的。

### 现代人文学术的理想追求：科学化

从中国现代学术建设的整个进程看，“科学化”无疑是最具感召力的一种趋势。

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本无“科学”的概念。晚明时，徐光启借用儒家经典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格物致知”理念，称传教士利玛窦等带来的西学中有“格物穷理之学”，自此，“格致”二字始有了与今日“科学”相近的涵义。进入近代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仍多以此指称来自西方的科技知识，如格致书院、《格致汇编》、格致科等。至1897年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在“理学总论”<sup>1</sup>中收录《科学入门》、《科学之原理》等书目，由是“科学”这一新名词遂从日本引入国内，至二十世纪初，日益流行，逐渐取代了“格致”一词的原先地位。<sup>2</sup>

“科学”一词在日本的出现，初义为“分科之学”，亦即“学科”之意。稍后则用以统称西方的学术技艺。其在中国，最初的内涵大致亦不出此范围。如1900年，杜亚泉在《〈亚泉杂志〉序》中称其旨乃在“揭载格致算化农商工艺诸科学”。<sup>[33]</sup>王国维《欧罗巴通史序》则谓：“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系统者何？立一系以分类是已。分类之法，以系统而异。”<sup>[34]</sup>严复的说法，界限似乎要森严些，主张“凡学必有因果公例，

可以教往知来者，乃称科学”。<sup>[35] (P125)</sup>而就当时学术界的一般认识而言，其对“科学”实多持一种广义的见解，即认为“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sup>[36]</sup>在不少人看来，“科学”不仅是指自然科学，也覆盖了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甚至与史学、文学也有密切的关系。王国维在为樊炳清译《东洋史要》所作的序中即指出：“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sup>[37]</sup>汪荣宝编《史学概论》也说：中国传统史学“不过撮录自国数千年之故实，以应用于劝善惩恶之教育，务使幼稚者读之而得模拟先哲之真似而已。”故至多只是一种叙述，“而未能完成其为科学之形体。就此众多之方面与不完全之形体，而予以科学的研究，寻其统系而冀以发挥其真相者，是今日所谓史学者之目的也”。<sup>[38]</sup>1911年，王国维还对“科学”与史学及文学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解释：“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然各科学有各科学之沿革，而史学又有史学之科学（如刘知几《史通》之类）。若夫文学则有文学之学（如《文心雕龙》之类）焉，有文学之史焉。而科学、史学之杰作亦即文学之杰作。故三者非截然有疆界。”<sup>[39]</sup>认为即使是文学，也存在着研究其学科自身特点和理法的“科学”层面。

“五四”时期，科学思潮的蔚然勃兴，使越来越多的人认定，随着科学的进步，“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sup>[19]</sup>陈独秀还强调：“今后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以为这就是科学，也可以说是哲学。”<sup>[40]</sup>在此类信念的主导下，推进人文学术科学化的呼声显得更趋强烈。

这种“科学化”，就其学术建构的观念层面看，主要在于确立各学科知识结构的系统性、治学的客观理性精神及其方法的严密性，强调惟“有系统之真智识”，才可称为科学；科学的态度，首在“尊疑”和“重据”；<sup>[41]</sup>而方法的科学化，则尤居于核心的地位，“因为研究学术的最正当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所以科学——广义的科学——就是合法的学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虽含有某些科学因素，但由于未经科学方法的处理，仍多为一种“杂乱无章的零碎智识”，故“只可以算得未成形的科学”。<sup>[42]</sup>这正是“五四”一代新学者，如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傅斯年等亟亟于宣传并从事科学方法建设的用意所在。

而从整个实践层面看，则可发现，尽管学术界在确定上述现代学术的建设目标上并无太大的分歧，但因各家对“科学化”含义的不同理解，其具体实施路径又往往表现为二种不同的取向：

一是倾向于直接比附自然科学的现代学术建设路向。

这可以胡适和傅斯年为代表。胡适一生倡导运用科学方法治学，自谓其所崇信的实验主义方法“就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用的方法”和“科学实验室的态度”。<sup>[43]</sup>在他看来，就方法论而言，哲学、史学等学科与自然科学间并无本质的区别，清代朴学在方法上的科学性与西方近代科学是同等的，只是由于两者研究的材料和范围不同，前者仅施之于典籍文字资料，后者则以蕴有无穷实物材料的自然界为考察对象，才造成了结果的不同。<sup>[44]</sup>傅斯年的态度更为鲜明，他一再强调：“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sup>[45]</sup>按照他的解释，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建立，本意就在发展“近代科学”，而“非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其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sup>[46]</sup>故史语所的工作目标，就是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不仅极力主张在研究中加大田野考古和实地调查等“实验”性环节的比重，自称“我们不是读书

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还把史学“科学化”的全部工作，从一般意义上的“史学”收缩到了史料学的范围内，认为：“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中世中古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sup>[47]</sup>至于史论和历史哲学，更不在“近代史学”的考虑范围之内，“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与史学是不同的”。<sup>[48]</sup>在他眼里，编史、论史和阐述历史哲学，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成份，完全受看不见摸不着的观念支配，缺乏一般实验科学所应具备的客观是非评判依据。唯有史料学，其所研究的是现实存在的文字资料或历史遗存实物，有着与自然科学相仿的比较确定的对象和验证依据。因此，他认定，在旧日史学的范围中，能够进入近代科学殿堂占居一席之地的，只有史料学。并谓，历史本无“定例”，“科学史学”的任务只在就史料论史实。其治史名言：“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存而不论，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sup>[47]</sup>也正是本此原则而发的。

这种观念，由于过分强调“科学”的共性，人为地弱化了人文学术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的差异，显然是片面的。事实上，人文学术面临的是充满生命与思想活力的社会现象，其讨论对象的流动不居和多样性，决定了这类认识活动较之于自然科学另具一种特殊的复杂性，因此，对于历史学这类学科的“科学化”，很大程度上恐怕只能站在广义科学而不是狭义科学（仅指自然科学）的立场上加以理解和操作。如果完全比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推进其“科学化”，在实践上往往易陷于两种偏向：不是把复杂多样的社会现象简单化或庸俗化，便是大大缩小其认识事物的范围和功能。需要指出的是，那种以为只要把材料梳理清楚，便可使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臻于客观化的设想，至少忽视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这些资料，作为人类有意识的社会活动的产物，无不或多或少地带有某些主观的成份，也就是说，其所反映的事实和客观实际之间仍然可能存在着一定距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研究者能抱纯客观的态度（实际上这也是很难达到的）把材料梳理清楚，结果也不能保证一定达到客观的认识境地。而从历史研究的整个程序看，自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到史实的解释、重建和史书的编写，本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实现史料学的科学化，固然有助于推进整个史学的现代化建设，但却并不等于就是“历史科学”的全部。史事的解释、因果关系分析及史实重建，同样需要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努力使之趋于合理或接近历史真相。如果按照傅斯年等人的观点，把史学的“科学性”完全锁定在史料和局部史实考证的微观层面上，那就无异于割裂了历史学科自身的整体结构，阻断了科学视野的合理拓展，同时也无以应对综合解释历史过程的实际需要。

二是以社会科学为比照模式的建设路向。

社会科学是关于社会的系统知识体系，起先出现在一些以较直观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后渐扩展至人文学术领域。在我国，史学等人文学科的社会科学化则是在社会学的直接影响下起步的。

社会学是十九世纪中叶兴起于西方的一门社会科学，创始人为法国的实证主义者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经英国学者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阐扬，逐渐发展为一门包括人类学、人种志学即历史发展总理论的包罗万象的学科。在孔德看来，社会现象尽管看去变化无常，较自然现象更为复杂，但同样受到某种自然规律的支配，因而完全可以通过观察、实验、比较等实证科学的方法去发现这些规律。斯宾塞也认为，社会学研究依据的虽是历史事实，但方法论却接近于生物学，其关注点并非人类生活的偶然事件，而在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条件和进化轨迹。由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历史学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故这种以探索社会演变规律为宗旨的理论及方法很快就被引入了史学领域。英国史家巴克（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出版于1857-1861年的两卷本《英国文明史》（系

未完成之作),便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该书在建立“历史科学”实践方面的大胆尝试,使人耳目一新,有力地促进了作为“理性探索”的近代历史学的发展。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斯宾塞和巴克尔的著作相继传入中国,对于国内史学的社会科学化立即起了强烈的催化作用。1897年以后,严复在天津《国闻报》发表据斯宾塞《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 1873)第一、二章译述的《劝学篇》,并于1903年以《群学肄言》为名全译出版。该书详细论述了社会学得以成为科学的理由,指出:“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并比较了旧史学与社会学的差别,称“读史而但观古人之事迹,虽考之甚密,必不足以得盛衰治乱之由。惟知求群学,籀其公例者,乃能据往事知来者耳”。<sup>[49]</sup>受此影响,一些史家纷纷要求参照社会学的原理改造旧史而建立理想中的“新史学”。1902年7月,章太炎在翻译了日本学者岸本武能太的《社会学》后,兴奋地写信给梁启超说:“酷暑无事,日读各种社会学书,平日有修中国通史之志,至此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sup>[50]</sup>并认为修中国通史,当“深识进化之理”,“因是求之,则达于廓氏(廓模德,今译孔德)、斯氏(斯宾塞)、葛氏(葛通哥斯,今译吉丁斯)之说,庶几不远矣”。<sup>[51] (P141)</sup>麦仲华亦在所译的《人群进化论》中说:“夫史学之异于人群学者,知述一国特别之事,非解释万国普通之理也。然不先知普通进化之理,则难知特别进化之理。故非本于人群学,则史学难成。”<sup>[52] (P3)</sup>梁启超的《新史学》更是反复强调历史学应以“群”、“群体”、“人群进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谓“历史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鉴此,这一时期史学“科学化”的初步实践,大多集中在要求改变旧史学专重政治和英雄伟人事迹的狭隘格局,注重从宏观角度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方面,而其着眼点,则在倡导以进化论重新认识历史,拓展研究视野,以具有社会史性质的“民史”和“国史”取代昔日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

“五四”以后,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继续二十世纪初以来的努力,更为广泛地吸取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以推进史学的学科独立与知识结构重新整合,侧重于从宏观角度讨论社会历史的演变趋势。其情形正如有人所说的,“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彼此交互影响的关系,在近今几乎是分不开来的:社会科学每有所见,必定立刻要影响到历史科学;而历史科学每有所得,也必定因影响到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之进步,以其论断来研究历史,历史的眼光便宽展了许多,而历史的事件,为从前所不注意的,也都显出它的真价值来了。”<sup>[53]</sup>1920年朱希祖出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后,还按照“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sup>[54]</sup>的理念,对史学系课程作了改革,确定“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为史学基本知识,列于必修课……使学生一改其研究史学之心理,不致专以多识史事为史学”,以便将旧日“文学的史学,改为科学的史学”。<sup>[55]</sup>这些人虽已不再如二十世纪初年那样热衷于谈论历史的“公理公例”,但仍有人对此持肯定的态度,认为“虽然人类活动非常复杂不定,但从‘大势’上观察出共同趋向和变迁线索,是很可能的。”<sup>[56]</sup>另一种是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历史学科。在这方面,最早迈出实质性步伐的是李大钊,后经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与实践体系。这一体系,不仅进一步确认了历史学是一门探索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科学,还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以各时代经济基础的变化为主要依据,结合其政治、文化等因素,从宏观的视角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和特点展开了综合考察和解释,从而把历史学的科学化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这两种“科学化”的努力,尽管取径不一,程度也有深浅,但都从不同的角度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现代学术的建设。

当然,对于人文学术“科学化”的走向,现代学术界也存在着另一种声音。对于那种处处比附“自然科学”的“科学化”做法,批评者指出其完全忽视了人文学术的自身特点,只会将之引入歧途。其中,熊十力的看法最为激烈,他指责那些打着“科学方法”旗号而专

事琐碎考据的人不过是拾乾嘉朴学的余唾，“锢生人之智慧，陷族类于衰微，三百年汉学之毒，罪浮于吕政（指秦始皇），而至今犹不悟，岂不痛哉！”盖“治史必究大义，本天化以征人事，鉴既往以策方来，其义宏远。若专考琐碎事件，何成史学？如因一胡人传之文理欠顺，但疑此胡人为李唐之祖。又或以大禹为虫。若斯之类，已足慨叹……依他人花样，而剪裁吾之史料铺陈之，何可究吾之真。就治史者言之已如是。余治经、治子、治集部者，都无有体究义理，只喜作琐碎考证。或缘时下流行之肤杂思想，而张设若干条目，遂割裂古人书中文句，以分述之，如某观念也，某论或某说也。如此方式，列有多目，皇皇大文，公之于世，鲜不赞美。以此为学，求其有得于心，有验于身，有用于世，可成为人，吾不敢信，吾不忍言。”<sup>[57]</sup>更多的人则对历史是否存在规律的问题提出了质疑或反对。如陈训慈认为：不能将社会现象与自然界现象等同而观，因“自然界已全然存在，虽繁复而可试验；而史则上推无始，前进无穷，错综繁博，其性质全异于他学。故吾人推求因果，亦但就可能之内，有以殊于自然界必定之因果。故史是否科学，在今日尚为问题。”<sup>[58]</sup>何炳松亦指出：“至现代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发达以来，史学一门，颇受影响。世之习史者，不谙史学之性质及其困难，妄欲以自然科学之方法施诸史学，以求人群活动之因果；或欲以社会科学之方法施诸史学，以求人群活动之常规。其言似是，其理实非。”因史家所求乃在具体事实之因果关系而非定律。“盖定律以通概为本，通概以重复为基。已往人事，既无复现之情；古今状况，又无一辙之理，通概难施，何来定律乎？”史学之被称为“科学”，实际上仅是从“其为有条理之智识”和倡导“志切求真”的科学精神看，尚不失某些“科学”特征之故。<sup>[59] (P12, 15)</sup>正是这种不满情绪，促使一些学者在时代学术主潮急趋“科学化”之际，试图另辟现代学术建设的蹊径以纠其“偏”，新人文主义的崛起，便反映了这一学术思潮的动向。

新人文主义为美国哈佛大学文学教授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首创，其说以为近代以来，西方物质之学大昌，功利主义盛行，而人生之道转晦，宗教道德势力衰弱，是非善恶观念将绝，乃至世界各民族常以互相残杀为事。究其原因，实缘工具理性过分膨胀，误导人们简单地“以自然之律施于人事，则理智不讲，道德全失，私欲横流，将成率兽食人之局”。<sup>3</sup>他指责以培根为代表的科学自然主义和以卢梭为代表的感情自然主义或专务物质而不免为物所驱，或率意任情而自陷于放纵私欲。至于尼采的唯意志论和柏格森主张任情纵欲的精力冲动之说，则又导人以无限的权力扩张欲。凡此，皆忘却了人生道理和自律，结果必然使整个社会“徇物而不知有人”，持强凌弱，战祸蜂起，其害不可胜言。欧洲大战的爆发，便是一个明证。为此，他主张重新估价并倡导人类的道德文明，建立起“物质之律”与“人事之律”相互协和的社会文化秩序。所谓“物质之律”是指人类对物质世界的征服和追求，它表现为科学主义；而“人事之律”则是指人类对自身充满欲望的“天性”之约束与净化，以“使人精神上循规蹈矩、中节合度”，它表现为道德的智慧。在现代文化建设的取向上，白氏反对割断历史，主张继承“一切时代共通的智慧”，即从世界文化汇通的高度来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荟萃人类历史上佛教、耶苏教、儒家和古希腊诸文明之精魂，加以变通而施于今日之社会人生。新人文主义的出现，固然是因科学主义过分膨胀而起的反动，但它和当时西方流行的非理性主义或相对主义思潮坚持与科学主义的对立不同，而是主张以人文主义弥补科学主义的不足，以道德理性与科学理性相互调剂，以纠正社会偏于一端的畸形发展。因此，新人文主义又称“批评及实证之人文主义”<sup>[60]</sup>

“五四”时期，新人文主义经白氏弟子梅光迪、吴宓等人传入国内，成为《学衡》同人反对文化激进论的重要理论依据。从新人文主义的理念出发，他们反对胡适等人奉科学实证为极则的学术取向，认为对历史等社会现象的探究，除实证之外，尤应具备人文关怀的精神，

以更能体现“人事之律”的人文主义救实证主义的不足。“古史辨”讨论中，“学衡派”阵营的南京高师学生刘掞黎即据以提出了古史研究“总须度之以情，验之以理，决之以证”<sup>[61] (P164)</sup>的观点。对此，胡适曾加以批评说，“决之以证”固然很好，但“度之以情”和“验之以理”却是危险的，因为“历史家只该从材料里、从证据里去寻出客观的条理”，如以今人之“情”与“理”去揣度古史，就必然会掺入自己的成见，最后使“断之以证”也不免为主观意见所左右。<sup>[62] (P194, 196)</sup>站在实证主义的立场上，胡适的批评自然理由十足，殊不知这正是新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方法论的分歧所在。

在现代史学的建设方向上，该派史家柳诒徵认为：“史非文学，非科学，自有其封域……近人欲属之科学，而人文与自然径庭，政治、经济、社会诸学皆产于史，子母不可偶，故吾尝妄谓今之大学宜独立史学院，使学者了然于史之封域非文学、非科学。”<sup>[63]</sup>陈训慈也说：“史学之能成科学与否，实非至要之问题。史学当有条件的采用科学方法，已为必然之趋势。惟详考其性质，最近学者皆确信其与自然科学迥殊。故纵多以科学相称者，亦必申明其非自然科学之意。然则史学之所包含者广，吾人但求其实际之裨益，初无须以为必成科学，而后足见史学之伟大也。”<sup>[64]</sup>而在治学方法上，他们力主考证与“通识”并重，认为“历史之学，最重因果。人事不能有因而无果，亦不能有果而无因。治历史者，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以诏示来兹，舍此无所谓史学也。”<sup>[65]</sup>

尤可注意者，同在哈佛大学留学而受到白璧德影响的陈寅恪和汤用彤，还在熟练运用考证法治史的同时，十分强调对古人或古代思想应具一种“同情”式的理解。在佛教史的研究过程中，汤用彤就指出：“中国佛教史未易言也。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辩，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深弘。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sup>[66] (P655)</sup>陈寅恪对此尤有精微的阐发，他说，研究历史特别是古人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片断，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所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sup>[67] (P279-280)</sup>观其之意，所谓“同情”者，乃在提倡研究者以历史主义的立场，透过直观的材料层面，对古人的思想和行为作一种设身处地的“移情”式理解，如此，则既得避免“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

同情之默应”的“科学主义”倾向，又不致脱离基本事实的框架去作“穿凿附会”的发挥和无依据的玄说，裨研究之结果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显然，新人文主义提供的这一学术方法论境界，目的是希望通过考证与“同情”、史实表层考察与深层涵义体悟的结合，在本已裂痕重重的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设起沟通的桥梁。

比较新人文主义和前述诸家史学“科学化”的主张，还可发现这样几个明显的特点：首先，从各家关注的重点看，如果说以“自然科学”为模式的“科学史学”理论上强调的是史料与具体事实考证的微观层面，而“社会科学”化的历史科学重在研讨社会发展规律等宏观层面事态的话，那么，新人文主义则旨在兼顾两者，即要求在史料收集和考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总汇贯通，了解其先后因果之关系”，<sup>[68]</sup>对历史作出贯通的理解。当然，其所关注的“因果关系”并非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规律，<sup>4</sup>而是指人事得失、文化盛衰及国家民族之兴亡等，因而更多地属于一种“中观”层次的研究。其次，在治学方法上，与傅斯年等理论上持“存而不论，证而不疏”（傅氏的史学实践事实上也并非完全如此）的方针不同，新人文主义史家大多十分强调治史过程中的“通识”、“通解”和对“史义”的发掘，亦即对历史的理解层面工作。柳诒徵至称：“史学所重者在义也。徒骛事迹，或精究文辞，皆未得治史之究竟。”并说：“穷人理，该万方，治史而能着眼于此，始不致徒以史求史，而经世之用无穷矣。”<sup>[69]</sup>（P199, 124）惟此种“史义”之发掘，就其解释系统而言，与西方史家常用的历史思辨哲学或社会科学理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乃是一种本土色彩很浓、更近乎中国传统人文意识的“义理”观。柳诒徵的学术经世观、陈寅恪的民族文化史观等都反映了这一点。最后，与“科学化”主要表现为按西方现代模式改造中国学术的取径不同，新人文主义从肯定“一切时代共通智慧”的价值观出发，其文化建设往往更侧重于对民族传统的继承一面，这也正是其学术带有较多的传统人文气息之故。

应当看到，新人文主义的上述主张，尽管与现代学术史上居于主流地位的“科学派”表现出某种异趣，但其理论和实践，对于丰富现代学术建设的内涵并使之更趋合理化，仍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积极意义。

这是因为，一方面，作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主流的“科学化”实践，本身并非十全十美，特别是存在着明显的“泛科学主义”倾向，最常见的是，在分析某些历史现象时，为了说明“规律”的存在，往往比较强调其“共性”和“刚性”的一面，而忽略其个性与多样化的趋势。如胡适为了证明中西文化的差异实为一种古今时代之差，摆出的依据就是：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的生理构造和生活需求如衣食住行等大致相同，那么，各民族的发展道路也必然大同小异，“我们拿历史的眼光去观察文化，只看见各种民族都在那‘生活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sup>[70]</sup>从而完全否认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性。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为了论证五种社会形态对各国历史的普遍适用性，也从人类生理发展的共性引出了这样的道理：“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sup>[71]</sup>对于这种带有“自然主义”机械论倾向的思维模式，新人文主义强调从人文和个性角度去审视社会人事的主张，显然具有一种“矫枉”的意义。

另一方面，现代学术的建设，不仅需要广泛吸取西方现代科学的各种成果和进步方法，也离不开对传统学术优秀遗产的继承。从整个现代文化的建设过程看，认真处理好中西文化的融合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在现代史学史上，科学

实证派对清代考据方法的总结,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传统史学关注民生和社会现实的经世精神的发扬,都属于这一层面的工作。新人文主义的学术实践,则从另一种视角,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其以人文阐释与科学实证相结合的治学途径,不仅丰富了现代学术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也给后人以相当的启示。

### 现代学术的制度建构与运作

二十世纪上半期,在科学观念的主导下,围绕着现代学术的建设,学术界、思想界和教育界展开了多方面工作。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制度方面的建设,其成就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 (一)现代学术门类的设置和布局。

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类系统,经历过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知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厥后经二千年分化之结果,各科次第析出。”<sup>[72]</sup><sup>(P30)</sup>魏晋以后,四部分类法逐步确立,于是历代相沿成习。但依据现代学术的观念加以衡量,四部分类法不但门类偏少,且不少学科边缘界限不清,分类无统一标准,缺乏内在的系统性。如经学中包含着政治学、哲学、史学、文学各类学问,史学也混和着天文、地理、社会、民俗诸学,都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中国早期学术的综合混沌特征。至于四部分类中的子、集两类,更是纯以著作外在类型为据的粗略归类,内容十分庞杂。这种状况的存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传统分类主要着眼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亦即注重各类知识的源流背景而轻其现实结构的变动所致。因此,即使南朝刘宋时一度出现过全按知识内容而分的儒、玄、文、史四学,也未能得到后世学者的普遍认可,宋司马光甚至还站在儒家正统观的立场上批评说:“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sup>[73]</sup><sup>(P3868-3869)</sup>

晚清以降,随着西学的输入,此种封闭的知识架构和粗糙分类体系始渐打破。在“中体西用”说盛行的时代,因传统学术的分类方法难以容纳日益增多的西学内涵,于是在涉略“新学”的讨论时,乃不得不引入其知识分类概念以为补充。如1896年梁启超发表的《西学书目表》将各类书分作四大类,其中“学类”下著录西学著作一百三十种,区为算、重、电、化、声、光、汽、天、地、人体、动植物、医、图等学凡十三目,几全取西学分类法;其余政、教、杂三类下之分目,则不免中西杂陈。故自谓“未有善法”,仅“取便学者,强为区别”而已。<sup>[74]</sup>次年康有为所作《日本书目志》的分类更趋西化,全书凡分生理、理学、宗教、图史、政治、法律、农业、工业、商业、教育、文学、文字语言、美术、小说、兵书十五门。各门下细目亦多取西法,如“理学门”分总论、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地质、博物、生物、人类、动物、植物、哲学、论理、心理、伦理诸学。当然,这还只是以西法施于外来书籍的分类。至二十世纪初年,对西方学术分类法的运用,已不再局限于“新学”的范围,而是直接渗入到了传统学术的研究之中。如刘师培在《周末学术史总序》中即主张按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计学、兵学、教育学、理科学、哲学、术数学、文字学、法律学、文章学这样的分类法,“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编一部新颖的先秦学术史。<sup>[75]</sup>而“国学保存会”计划设立的国粹学堂,也开出了类似的学习科目。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当时清廷制定的学校专业科目变化中看到这一趋势。如戊戌变法期间总理衙门筹议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参合中西学制,规定其“溥通学”科目为经

学、理学、中外掌故、诸子学、逐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等十科，另加外语（英、法、俄、德、日任选其一）；“专门学”科目包括高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法律归此）和地理学，以及农、矿、工程、商、兵、卫生（医学归此）等十科。<sup>[76] (P128)</sup>在作为基础部分的“溥通学”科目设置上，尤显出较为陈旧的知识结构布局意识。而1902年公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则规定，大学预科分政、艺两科，本科分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门，已大致接近于西方的分科设置，以致引起了张之洞等人的不安，特将原附于文学门的“经学”抽出立为首科。<sup>[77] (P560, 570-571)</sup>这一改变，反映了清廷依然试图维持经学作为各科主导的意识，也因此遭到了具有现代学术观念的王国维之质疑。在他看来，儒学“固非宗教，而学说也，与一切他学均以研究而益明。而必欲独立一科，以与极有关系之文学相隔绝，此则余所不解也。若为尊经之故，则置文学科于大学之首可耳，何必效西洋之神学科，以自外于学问者哉！”并指出，大学所定科目，尤不应将哲学排斥在外，观东西各大学之教学，无不设有哲学一科，盖人生对“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而“无论古今东西，其国民之文化苟达一定之程度者，无不有一种之哲学，而所谓哲学家者，亦无不受国民之尊敬，而国民亦以是为轻重”，故我国大学，不特当立哲学一科，且经学、理学、文学、史学各科中，均应重视哲学知识之传授。<sup>[78] (P644, 648, 651)</sup>虽然这一意见当时未被采纳，但到民国初年，却差不多成了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共识。1912年10月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即规定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取消经学科，其原有内容分别纳入文科相关系科。

至于整个现代人文学科的建设，此后也日有长进。1913年1月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确定文科分哲学、文学、历史学和地理学四门。其中，哲学门分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二类；文学门分国文、梵文、英、法、德、俄、意、言语学八类；历史学门分中国史及东洋史、西洋史二类。各专业方向下所设课程一般都在十门之上，最多的达十五、六门（中国史及东洋史、中国哲学），已具有一定的系统性。<sup>[79] (P1, 3, 5)</sup>以史学为例，在清末京师大学堂文学科中，本分中国史学和万国史学二门。中国史学主干课程定为史学研究法、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各种纪事本末、中国历代地理沿革、国朝事实、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四库史部提要、世界史、中外今地理、西国科学史等十门。万国史学除减少中国史内容而代以泰西各国史、亚洲各国史和西国外交史、年代学外，近一半课程同于中国史学门。其学科知识结构尚带有中西杂糅的分类特征。<sup>[80] (P779-780, 785)</sup>民国初颁布的《大学规程》，则规定中外史学同归历史学门，所设课程中增加了考古学、经济史、美术史、人类及人种学等具有现代气息的课程，只是北京大学未及时实行。<sup>[81]</sup>至1917年蔡元培出长北大，其文科才得在原有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与英国文学三门的基础上，增设了中国史学门，虽然初时开出的专业课程比较单薄，但经过几年的改造充实，到二十年代初，已初步形成了包括史学专业理论、中外通史、历史辅助学科和部分社会科学在内的课程体系，为现代史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石。<sup>5</sup>

这种现代学术分科概念不仅规定了民国时期各大学的科系设置，还直接影响到对“国学”内涵的重新认识，二十年代后成立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等，几乎都将“国学”划分为语言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美术等门类加以研究。

应当看到，“五四”以后，在科学观念的引导下，除了对史学、文学、哲学等一部分传

统学术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外,还顺应世界学术潮流,引进和创立了一批现代新兴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考古学、民俗学、经济学、教育学及各门自然科学,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学术的旧格局,逐步构筑起了具有现代文化视野,且比较齐全的学科门类体系,使中国学术开始真正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 (二) 现代学术理论范型的探讨和构筑。

中国学术界对现代学术方法论的自觉,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特别是严复、王国维等先驱人物的译著《穆勒名学》([英]穆勒著,严译,1905年金粟斋刻本)、《名学浅说》([英]耶方斯著,严译,1909年商务印书馆本)、《哲学概论》([日]桑木严翼著,王译,1902年教育世界版)、《辨学》([英]耶方斯著,王译,1908年益森印刷局本)等,使学术界对西方近代的哲学方法和逻辑思想有了一定了解。“五四”时期,经胡适等人对“科学方法”的大力鼓吹,思想界更是掀起了一股理论与方法的研讨热。在哲学领域,先后出现了实验主义、唯物主义、现代新儒家等各种流派。在史学领域,对学科方法论的探讨风气尤盛。

中国古代史学,虽素称发达,然其时史家普遍之观念,唯以记载史事为重,对于史学理论与方法,即使有所讨论,亦多属书法褒贬、编纂结构体例一类的经验性评论,很少构成体系,像章学诚这样在理论方面进行专门研究并有系统发明的,实在只是凤毛麟角。“五四”时期,在“科学”思潮的启示下,不少进步史家深感“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番破坏,断然不能建设。”<sup>[82]</sup>在他们看来,传统史学无论就观念还是内容看,有许多地方都不合现代科学的要求和社会之需。而欲改变此种落后现状,必先变革旧史观念及其治学方法。为此,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受到了史学界前所未有的重视。各杂志及出版社纷纷刊出有关史学理论的论著,一些有条件的大学史学系和史地系,还把历史学原理、史学研究法、中国史学概论、史学通论、历史哲学等列为基本必修课或选修课,将其作为提高学生专业理论素质和培养现代史学人才的重要手段。

这一时期发表的有关史学理论和方法之作,大致可分三种类型:一是对国外主要是西方现代史学理论著作的译介。二是运用现代科学眼光对传统史学方法的重新审视与系统总结。胡适即称其对清代朴学方法的总结,目的在于将其所用的“不自觉”方法变为“自觉的”。<sup>[83]</sup>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古书真伪及其年代》(1927)对清儒治学方法及古代辨伪学的总结,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1921)对乾嘉考据法的分析,何炳松《〈史通〉评论》(1925)、《章学诚史学管窥》(1925)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陈垣《校勘学释例》(亦名《元典章校补释例》,1931)对传统校勘学的归纳提高等,皆其中的代表作。三是有关史学基本理论的探讨及概论性的专业治学入门指导,如李泰棻的《史学研究法大纲》(1920),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1921-1927)和《历史统计学》(1922),李大钊的《史学要论》(1924),杨鸿烈的《史地新论》(1924),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1927)等。从内容上看,这些论著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历史学本身及其社会功能的认识。这本是旧史家十分重视而又谈得最多的问题,但“五四”时期的探讨,则另有一种特殊的时代特点,它反映了历史学的文化功能正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转换。鉴于旧史学一味强调为封建政治服务造成的种种弊端,不少人反对继续将史学充作“伦理教训”或“政治资鉴”的工具,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事实的客观的叙述,其中不能夹杂任何目的,史学家作历史,应该和化学家作试验报告具同样的精神。”<sup>[84]</sup>其基本作用应是实事求是地弄清过去的真相及现实社会各种事物或制度的由来,以帮助人们认识并解决现实问题和推测未来。对于封建史学仅注重记载政治史的做法,他们尤表不满,批评说:“旧日之历史,直可名之为政治史”,其“唯一基础,即为政治事实,而编纂史籍之理论

上唯一根据，亦惟有政治事实。甚有以为政治事实即为一切事变之原因，以决定历史之性质与发展者；凡非与国家生活有直接关系或其间关系为不易发见者，均为无研究之价值。”<sup>[85]</sup>这种观念，不仅无法反映历史的真实全貌，还常常会因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歪曲史实。事实上，“影响人类前途的除政治组织之外，尚有经济、思想、自然环境……等等要素，都不可轻轻撇过。并且除非把这些要素研究清楚，我们对于政治变迁的根本原因，也决不能了解。”<sup>[84]</sup>陈训慈的《历史之社会的价值》一文，还针对那种只看重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的实用价值而轻视历史学的倾向，阐发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历史学的功用至少有四端：一、助成完全之智识；二、影响人类之心理；三、进化之指导；四、促进人类之相互了解。故“史断非繁重孤僻之学，而为最普遍之学识，与社会息息相关……生而为人，既不能不有历史之常识。国人言新文化者，当亦知所深省矣。”<sup>[86]</sup>这些论述的中心，都在要求历史学从旧日专为统治集团“资鉴”的狭隘格局中解脱出来，成为一般社会大众所需之学问。

二是关于现代史学方法论体系的构筑和完善。这是当时史学界讨论最多的问题。在众多的论著中，有的按照人们研究和认识历史的系统运动过程，详细论述了从史料采集、鉴别、整理到史事分析和史著编写的方法，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等；有的致力于探讨历史学与哲学、文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宗教学、语言学、心理学、政治学、地理学、生物学、人类学等各种相关学科的关系，以及在治学方法上相互借鉴的可能，如陈训慈的《史学蠡测》（1924-1925）、李璜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1926）等；有的则结合历史实践，专论某种现代方法的价值和运用，如梁启超的《历史统计法》、卫聚贤的《应用统计的方法整理国学》（1929）等。这些讨论，对于现代史学方法在我国的进一步系统传播和运用，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三是如何看待历史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问题。“五四”前后，随着各种西方史学理论及哲学的传入，历史哲学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如缪凤林认为，史之目的在揭示社会演进活动之真，欲达此目的，“非哲学固无由进窥其之真际也。”<sup>[87]</sup>李大钊更指出：“人生哲学或历史哲学，特有关于历史事实，”那种以为史家只能以怡然虚静之智慧观察史实而“不宜豫存一先入为主的历史观”之见，其实并不现实。因为“史实纷纭，浩如烟海，倘治史实者不有一个合理的历史观供其依据，那真是一部十七史，将从何处说起？必且治丝益棼，茫无头绪。而况历史观的构成，半由于学问智识的陶养，半由于其人的环境与气质的趋倾，无论何人，总于不知不觉之中，有他的历史观在那里存在。夫历史观乃解析史实的公分母，其于认事实的价值，寻绎其相互连锁的关系，施行大量的综合，实为必要的主观的要因。然则史学家而有一种历史观，其事非概可指斥，不过要提防着过于偏执的或误谬的历史观就是了。”<sup>[88]</sup>为了寻求一种“比较完满之历史观”，一些史家进而对古今中外各种历史哲学作了认真介绍、比较、分析和批评。如陈训慈在《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中，结合中西史学的发展状况，对美术史观、宗教史观、道德史观、政治史观、哲学史观、个人史观、科学史观、社会史观、经济史观、地理史观、综合史观等十一类历史观作了考察评价，以“求其变迁之普通趋势。”<sup>[89]</sup>不仅如此，朱谦之的《历史哲学》（1926）等还对创建新的历史哲学体系作了尝试。

“五四”时期重视史学理论探讨的风气，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其时各种史学流派的形成，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学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的显著标志。而其总的倾向，则是要求在兼取中西史学之长的基础上，构建起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史学新体系。

### （三）现代学术专业人才培养机制的确立。

现代专业人才培养制度的规范化，是使各种学术成为独立知识领域并获得持续发展后劲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实现这一步骤，通常是“首先在主要大学里设立一些首席讲座职位，然后再建立一些系来开设有关的课程，学生在完成课业之后可以取得该学科的学位。”

<sup>[90]</sup> (P31) 中国现代人文学术人才的培养，便是通过大学或研究院的专业系统训练来实现的。而这一制度的真正定型，严格说来应在“五四”前后。

如前所说，作为培养专业人才的大学，我国在民国初年教育部发布的文件中已基本确立了按现代学术门类分科的布局。至1919年，属于文科的哲学、中国文学和史学都成立了单独系科，无论在学制、课程设置和教育模式等方面都日趋规范化。兹略述其史学人才培养之机制，以窥现代专业教育运作之模式。

自古以来，在我们这个具有重史传统的国家里，一直存在着少数以修史为职责的史官，但必须看到，他们的产生途径、职能、知识结构和治史技能等，都与现代职业史家有着性质上的差别。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在这方面出现了合乎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势。现代大学史学系的设立，“旨在研究历史之重要智识，期以阐明历史对于人类社会之关系，并策专精研究之效”。<sup>[91]</sup>从培养从事“专精研究”的人才需要出发，其课程设置也日趋系统化。如北京大学1917年初设中国史学门时，专业课仅中国通史、历史学原理、金石及考古学、民族史及宗教史、法制史、经济史、学术史、人种学等十门不到。<sup>6</sup>至该年1月改订课程复提出增加东洋通史、西洋通史、中外地理沿革、年代学、社会学、经济学、法理学及西洋法制史、欧美文明史、欧美政治史、欧美殖民史、中亚细亚地理及历史，以及欧美亚洲各国史等十余门，内容体系大为改观。<sup>7</sup>1920年朱希祖出任史学系主任后，对课程作了进一步改革，主要是加强了现代史学专业理论的训练和各种社会科学方法的引入。其时师范性质的大学如北京高师史地部的课程，虽偏重通论、通史一类而不及北京大学之专，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至二十年代末，大学历史专业的课程设置，已发展到了相当细密的程度。以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为例，其所开设的必修与选修课达四十八门，选修课尤为丰富，内容广涉中外各种专史、国别史、民族史和有关辅助学科。除此之外，学生还可选修外系的人类学、人生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经济原理、经济史、政治原理、政治思想史、社会史、文学史、哲学史、科学史、宗教史、美术史、教育史等有关课程。<sup>8</sup>这种情况，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现代史学专业人才培养在知识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新水准。

与此同时，学术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注意到一般大学本科的历史教学课程繁多，难以专精，因而主张建立研究院制度，以培养高层次的人才。1921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研究所国学门，并招研究生作专题研究，率先对此作了尝试。在这方面成就最为显著的，当推清华国学研究院。该院成立于1925年，由吴宓担任研究院主任，先后聘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人为导师，李济为讲师，专招“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底者”进行培养。学业一般为一年，特殊情况可延长至二到三年。其研究院章程规定：“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在科目方面，“先开国学一科，其内容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其目的专在造就下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

<sup>[92]</sup> 1929年，研究院因王、梁两导师相继去世及其他一些原因而宣布停办。其培养专业人才的制度和影响深远。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不少大学都起而仿效，建立了类似的研究生培养机构，如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年）、北京大学研究院（1932年）、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1931年）<sup>9</sup>等。

依据现代历史教学的需要，不少人对教科书的编写也作了新的探索。1921年，陆惟昭在《史地学报》发表《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商例》一文，提出十七条叙例，对教科书的观点、内容、结构、体例，以及附注、史表、插图、练习等技术性问题一一详加说明。次年

梁启超也针对当时流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偏重政治史,以致范围狭窄、内容单调之弊,提出了一个改造方案,主张“以文化史代政治史”,将中国通史纵断为年代、地理、民族、政治、社会及经济、文化六个专题共 192 课进行讲授,还详细开列了这六部分的编写章节细目。其中年代部分略述上古至清各代沿革,具有从时间上贯串全书的用意。其余五部分颇取法于旧史典志体,一般一课讲一事始末。从目录上看,社会及经济与文化两部分分量最重,共 101 课,占全书一半以上。牵涉内容也最广,包括社会习俗、经济制度和学术、科技、教育、天算、文学、艺术等各方面<sup>[93]</sup>。

在这一时期编写历史教科书的诸多实践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该书完成于 1920 年底,初版时作为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同时也是颇受社会欢迎的青年自修历史读物,后来被用作大学教本,风行于二、三十年代。其特点在于:(1)观点新颖。不仅在运用旧史料方面十分娴熟,叙事紧扣要点而系统条理,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史学根底,且因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著述中注入了新的学理,注重于说明社会“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2)结构合理。全书的编排结合了当时学校有关中国通史课程设置的具体情况,将整个中国历史划为秦以前、秦汉至唐、“安史之乱”至南宋、元至清中叶、“西学东渐”至清亡、辛亥革命以后六个时期,这样分期,不仅从历史上看有其合理性,也颇切合于当时历史教学的需要。(3)语言通俗,开创了以白话文著史之风,故被顾颉刚称为“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sup>[94] (P85)</sup>有的历史教材编写理论或实践还力求在满足中等层次者普及历史教育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适当的专业研究入门引导。如陆惟昭在讨论中学历史教科书编纂体例时,就建议在书末增添“史学概略”一目,“揭各种方法之大纲,并古今史书之良窳,史迹之推论与批评,与史学与人生之关系,以为自学之辅助。”使学生“进可以自由研究,退亦可以得一中史沿略之概念。”<sup>[95]</sup>进而成为一部分人升入大学史学系,接受专门训练的桥梁。

此外,在历史教学的方法上,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也形成了一些基本原则和规范。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主持教育的人,都觉悟以前的教学法有许多缺点,要想亟亟改良教学法。”<sup>[96]</sup>对历史教学法的讨论遂日益趋热,有关论著纷纷出现,如李学隽的《教授历史之研究》(载 1918 年杭州《教育周报》第 228 期)、蒋梦麟的《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载 1918 年《教育杂志》10 卷 1 期)、吴相如的《历史教授革新之意见》(载 1920 年《史地丛刊》1 卷 1 期)、何炳松的《历史教授法》(载 1925 年《教育杂志》17 卷 2-3 期)、初拓的《历史教育的改进问题》(载 1927 年《历史教育》1 期),以及徐则陵的《历史教学法》(1921 年《教育汇刊》第二集)等。同时,西方现代历史教学的某些理论方法,也被译介到国内。1921 年,张裕卿在《中华教育界》发表《历史科的教学法》一文,译述了美国加特斯(Charters)有关历史教学的主张,《史地丛刊》也刊出了李荫清译 Mendel E. Branom 的《历史的计案问题教授法》。稍后,朱经农翻译的《高初级中学历史教学法》、何炳松译《历史教学法》,以及李思纯译《史学原论》所附“法兰西中等历史教育”和“法兰西高等历史教育”,对西方历史教学情况作了更为系统的介绍。此外,全国性的教育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sup>10</sup>每年举行的年会,也都要对历史教学进行多方面的探讨。1922 年 7 月,该会在济南召开第一届年会,历史教育名家梁启超、朱希祖、徐则陵、何炳松、陈衡哲、柳诒徵等出席了历史教学组的会议,讨论了《编辑或讲授历史之标准》(何炳松)、《历史教育对中小学之作用》(徐则陵)、《中学以上学校之历史教授法应废讲义而重自修》(陈衡哲)、《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梁启超)、《中外历史及地理、历史课程分配安排》(朱希祖)等五项议案,并商定函请国内学者九人以上组织一中小学历史教学研究委员会,研究有关教学要求、教材、教法等。次年 8 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年会,又着重商讨了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与课程问题。并决定在《新教育》杂志发行“历史专号”,讨论中外历史研究法及历史教学法、历史读本教学法(中小学)等问题<sup>11</sup>。这类有组织的定期讨论和规划活动,对提高全国的历史教学水平无疑有着积

极的作用。

这一时期有关历史教学理论和实践的探索，牵涉面相当广。内容上，包括制定基本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和教学法等；教学层次上，从中小学的历史知识启蒙到高深学府的历史专业，应有尽有。其着眼基点，按蒋梦麟的说法，则在“扩张历史范围，改变历史方针，革新教授方法”，而尤重“利用西洋近年来教授历史之经验，体察吾国社会生活之需要，活用吾国历史之资料。著作家本此以编新历史，教员本此以为教授方法。”<sup>[97]</sup>

中小学的历史教育虽然并不直接以培养专业人才为目标，但却是开阔学生知识面，锻炼记忆力 and 思维推理能力，以及涵养其爱国心和道德情操的重要途径。同时，也可以为一部分人日后进入大学史学系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有鉴于此，教育界和学术界人士对中小学的历史教学普遍十分重视。针对中小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他们主张讲授历史应采用易懂易记，生动有趣的启发式教学法。如希甫在《历史教授法之研究》中就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向人们详细介绍了年代法（以事情发展的时间为顺序，可收循序渐进之效）、传记法（以著名人物事迹为中心、连带讲叙一时代之历史。长处是生动易记）、纪事本末法（以一事件为中心展开叙述）、圆周法（德人弥拉首创，其法每一学年或间一学年讲通史一遍，每一遍可根据学生程度而增加内容及深度。多用于中学）、逆进法（为迦普首创，即以某事之现状为基点，逆溯其由来，直至古代之情形）、问答法等各种方法。<sup>[98]</sup>何炳松的《历史教授法》则对学校历史教学的各个环节如教材及参考书的选定、讲课方法、引导途径、考试形式等均作了探讨，认为“教授历史应具科学的精神。所谓科学的精神就是注重普通人同普通的事”。要求让学生了解社会整体的演变，而不仅仅以了解英雄名士的事迹为满足；同时在方法上切忌死板，应努力“使得过去能够‘活现’出来”，如组织学生游历古迹，参观实物，注意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独立思考能力等，进而逐步引导他们掌握治史的基本方法。<sup>[99]</sup>柳诒徵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上还提出了一项附论《中小学历史教学的意见》，主张将书本教育与实物古迹、乡土地理、公民教育结合起来，并设计了一个具体实施方案：一、二年级完全据实物讲授历史，以增实感性；三、四年级以实物与教材对照学习；五、六年级和中学前三年以书本教学为主，并渐引导学生阅读历史文献资料。这样，日后“到高等专门学校、大学校里面，就可以谈到历史的学术了。”<sup>[100]</sup>

作为直接培养专业人才的大学，这一时期在历史教学方面所作的探索，对现代史学发展影响尤大。如为了引导学生的自主研究精神，北京高师史地部的教学采用了“自学辅导为主”，并注重考察调查与测绘等实习科目的方法。北京大学史学系则在一般课程之外，经常开设“特别讲演”，就关系中外史学、各时代风气与特点，以及人种、社会、中外文化交流与比较等各类问题进行专题论述，<sup>[101]</sup>以拓深学生的思路和提高其专业研究素养。尤其是朱希祖主持系务期间，鉴于史学系课程太繁，讲授亦多为灌注式，不利于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研究能力，“乃分四年课程为二部，前二年授史学的基本科学及通史，后二年使各就性之所近，专选一课为专门之研究，其余选择其所必需之课听讲……于是由普通史的灌注进而为专门史的研究”。朱氏还提出了一个因材施教的方案，即按照学生的各自条件与志向，将其分为两类：一类以培养历史著作家为目标，除加强各种专业基础知识的教学外，另增设“历史文艺课”，以利其提高历史写作能力，日后“著述国史，翻译外史，文理察密，足以行远”。另一类以钻研历史哲学或理论为职志，可不习各种专史，然“于普通史之外，须从事社会科学及哲学，博学深思，经纬万有，著书立说，指导人类，蔚为史学正宗。”<sup>[55]</sup>

至于大学研究院的教学，就更体现出以专精为主的特色。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例，其制“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中国的书院起于唐，盛于宋以后，本土子研习科举制艺及理学家讲学授徒之所。清乾嘉以降，考据盛行，流风所被，始有以考证经史为主者，如广州学海堂、开封大梁书院、江苏南菁书院、吴中正谊书院之学古堂等。共课士，尤重自学及治学门径指导。学生于听讲外，须将每日读书（包

括泛读和专题阅读)心得及疑问记下,定期交院长等批答,裁定优劣,以策其精。清末康有为在长兴学舍和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教学,都曾取法于此。清华国学研究院则进一步将其与西方的某些教育制度结合起来。其教学方式,分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两项。所谓普通演讲,与一般大学注重基本知识面的做法不同,完全是专题式的。如王国维的《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仪礼》及《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梁启超的《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陈寅恪的《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文法》等,皆几位导师长期研究之结晶,学生每人至少须选择四种,定期听讲。专题研究则由学生在导师指定的学科范围内,根据本人志向和学力情况确定题目,作为一学年内的研究目标。对导师,则要求对“专从本人请业之学员,应订时间,常与接谈,考询成绩,指示方法及应读书籍”。<sup>[102]</sup>实践证明,这些方法,对于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拓展其思维和科研能力,是十分有效的。

正是在教育界和学术界的上述努力之下,我国历史专业人才的正规培养自二十年代起逐步形成了从中小学、大学到研究院的不同层次而又相互衔接的教学体系,出现了可喜的发展势头。兹仅举三例为证,据有关资料统计,北京大学史学系1920年至1930年间毕业学生就达121人,<sup>[103]</sup>而1920-1923年间毕业的哲学系学生为81人,国文学系学生为78人。<sup>12</sup>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系1926至1937年间的毕业生为53人,加上高等师范部文史专业28人,共计81人。<sup>[104]</sup>清华国学研究院自1925至1929年前后共招收四届研究生,毕业74人,<sup>[105]</sup>其中不少人,如吴其昌、刘盼遂、徐中舒、高亨、姚名达、谢国桢、刘节、杨鸿烈等,后来都成为我国现代文史学界的栋梁之材。如果加上同时全国各高等学校或文史专科学校培养的专业人才,数量就更为可观了。

#### (四) 现代学术研究机构之建置。

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史专业研究机构,是“五四”以后首先在高等院校出现的<sup>13</sup>,其中最早当推北京大学的研究所国学门。该机构成立于1921年底,初由沈兼士任主任,下设编辑室、考古学会、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明清档案整理会、方言调查会等,致力于分途搜集各项材料,并招研究生进行专题研究。<sup>14</sup>二十年代中后期建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1929)、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1931)、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1932)、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30)、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1)和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4)等,也都属这种性质。至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在广州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始有国家行政当局系统的文科研究机构出现。该所初拟按历史、语言两大类设组,历史下设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物、比较艺术五组;语言下设汉语、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语言学四组。次年迁北平后,复将全所重分为历史、语言、考古三组,分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为主任,1934年又增设人类学组,以吴定良为主任。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也成立了学术研究机构,如1929年筹备建立的国立北平研究院,其下亦设有史学研究会,其初计划主要从事《北平志》、《北方革命史》、《清代通鉴长编》的编纂和地方考古工作。

这些研究机构的设立,为推进各项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通过这类按现代科学观念组建起来的研究机构,可以使一些相关学科的研究得到合理协调,变原来分散的个人研究为各学科专家的通力协作,形成一种“集众的工作”局面,以便对某些高难度课题展开多层面的综合研究。如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就聚集着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李方桂、董作宾、张政烺、梁思永、徐中舒等许多当时国内一流人才。其对边疆少数民族的体质、语言、风俗、文物、制度以及安阳殷墟发掘物的整理研究,也正是依靠这些专家从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各方面进行综合研究,才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其次,初步确立起我国现代学术发展规划的社会机制。这些研究机构一般都制定了较长远的科研计划。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之后,即由马叙伦起草了一项《整理国学计画》,提出从系统

整理各类学术资料和研治传统学术两方面入手清理文化遗产的计划,并规定了搜集文献和文物古器实物材料的具体方法与步骤。<sup>[106]</sup>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也在考古发掘、整理旧档文献及调查民俗资料、语言及方言变迁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规划。虽然这些研究计划,因其时政局动荡和战乱之故,在实行过程中不免时作时辍,但其积极作用仍不可低估。第三,便于动员行政当局和社会其他力量,从物质上为一些较大规模的学术科研项目建立基础。如1924年以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考古学会组织人员先后调查了北京大觉寺、大宫山古迹、碧云寺古冢、圆明园文渊阁遗址、甘肃敦煌古迹。与此同时,还利用各种关系,向社会征集图书和古器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搜集了金石、甲骨、玉器、砖瓦陶等古物4,087件,金石拓本12,553种。1929年,又与北平研究院及古物保管委员会合组考古团,发掘燕下都故址北之老姥台,获得了大量古代兵器、钱币等文物。<sup>[107]</sup>尤其是中央研究院,更实施过不少大型学术研究规划,如在民族学研究中,先后组织调查了广西瑶族、湘西苗族、东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浙江畲族、云南傣族,以及贵州、四川、台湾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现状、风习、制度和古代羌、戎等族遗迹。至于其对殷墟的考古发掘,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这些学术活动,如果没有学术上、物质上具有相当活力的学术研究机构从中主持,完全是不可能的。

#### (五) 现代专业学会与学术杂志的出现与运作。

现代专业学会的大量出现,是世界各国学术走向专业化和学科独立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国,虽然二十世纪初就零星出现过诸如湖北史学会(1908年11月成立)一类的学术组织,<sup>15</sup>但往往随生随灭,并未形成风气。“五四”时期,随着现代学术专业队伍的日趋形成和扩大,学术界对于建立各类专业学会的呼声日高。

如1921年,陈训慈在《史地学报》一卷二期发表《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专就建立史学之事作了讨论。他认为,在中国,“组织史学会殊不容缓”。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倡导新史学之声虽日盛,然其发展仍存在诸多不尽人意处,尤缺乏“专精之研究”,“诚使有史学会为之中心,于古文化为忠实之研究,以发现完全之过去,则必可畀中国文化以正当之地位”。因此,应通过建立专业学会一类的学术团体,动员组织各方面的专业研究力量,分工合作,将有关研究推向系统和深入。文中,他还从整理旧史、编订新书、探险考察、保存古物、组织图书馆博览室、促进清史编纂及注重当代史料搜集等六个方面论述了史学会的任务,主张“参酌西制,以为规画。至其着手组织,可由各大学史学教授及专门史家联合发起,再征集博学同志,筹集经费,建筑会所,然后逐渐扩充。而同时国人亦可自由别组、务使吾国学术研究之精神,并驾西国,携手共进,作远大之企图。”其后,又在《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等文中一再发出类似呼吁。在此前后,一些大学史地部或史学系的学生首先对此作了尝试。1920年,北京、南京和武昌三所高等师范学校的有关专业学生分别成立了史地学会、史地研究会和国文历史地理学会(后改为文史地学会),出版了会刊。1922年11月,北京大学史学系学生也成立了史学读书会,订立九条章程,规定以研究中外历史、科学史和考古学等为宗旨。此外,还有1927年成立的燕京大学历史学会<sup>15</sup>和稍后的成都大学史学研究会等。上述学会中,以南高师的史地研究会组织最为完备。该会前身为1919年成立的地学研究会,次年5月改此名时,有会员73人,以后每年略有增减,1921年为64人,1922年2月为85人,王庸、陈训慈、胡焕庸、张其昀、缪凤林、郑鹤声、张廷休、刘掞蓁、束世澂、向达、王玉璋、范希曾等皆其中骨干。研究会先后聘请柳诒徵、竺可桢、徐则陵、白眉初、萧叔綢、陈衡哲等教授为指导员,定期开展专题讲座、学术讲座等各项活动,制定研究计划,编辑出版《史地学报》,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学会的不少会员后来成了国内史地学界的知名专家,1926年成立的中国史地学会和其后的南京中国史学会,也正是以这些人为骨干建立起来的。三十年代以后,此类学会出现更多,影响较大的如1932年10月北平各大学史学系师生联合发起成立的地区性专业学会“北平史学会”<sup>16</sup>胡朴安发起成立的“中国学

会”，以及顾颉刚等发起的历史地理专业学会“禹贡学会”和陶希圣发起成立的中国经济史专业学会“食货学会”等。

这些专业学会，一般都有自己的会刊。除上面提到的《史地学报》外，还有北京高师史地学会的《史地丛刊》、武昌师范大学文史地学会的《文史地杂志》、南京中国史学会的《史学杂志》、燕京大学历史学会的《史学年报》、成都大学史学研究会的《史学杂志》，以及《学衡》、《禹贡》、《食货》等，如果加上其他一些单位主办的文史杂志、国学杂志或各类学术杂志，数量就十分可观。学术研究专刊的出现，固不始于“五四”时期，在清代的书院中，便有过类似的书刊，如《诂经精舍文集》、《学海堂文集》、《菊坡精舍文集》等，专择学生课业佳作，刊布成帙，其专著则汇为丛书，如《南菁书院丛书》、《学古堂日记》等，当然并非定期，且多属杂记性质，只能说是中国早期学报的雏形。至二十世纪初年始有真正近代式的定期学术刊物出现，较早的如1905年创刊的《国粹学报》等。但数量极少，其时大部分期刊，仍为包罗时事、新闻、述评、杂说、文艺的综合性刊物。“五四”时期的学术专业刊物，无论就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把国内学报类刊物的编辑出版推进到了一个新的现代发展水平。

通过这些刊物，大量运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的专题研究论文和其他成果得以贡诸于世，有的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尤其是其中的《史地学报》、《史学年报》，以及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国学论丛》、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专刊和集刊等，对于学术界树立严谨扎实的治学风范，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更重要的是，各类学术专业杂志的纷纷出现和持久活动，不但使我国现代学术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和活跃，且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各项专题研究的深入，乃至整个学术专业化的建设，都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上述现代学术的制度和运作，应当说在相当程度上直观地展示了中国人文学术现代化的进程及路向，其成功与缺陷，都将给今天的学术创造以莫大的启迪。

### 参考文献:

- [1] 张之洞.劝学篇·自序[M], 中江书院刊本, 1898.
- [2] 杨度:游学译编叙[A], 游学译编(1), 1902,11.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C]248-249, 北京:三联书店.19604.
- [3] 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A].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C].49.
- [4] 邵作舟.邵氏危言[A],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C].183.
- [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M].263
- [6] 古吴困学居士.广学会大有造于中国说[N].万国公报(88), 1896-5.
- [7] 敢生.新旧篇[A].觉民(1-5期合本), 1904.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C]第1卷下册.852.
- [8] 国粹说之误解足以驯至亡国论[N]. 广益丛报(237号), 1910-7.
- [9] 劝游学书[N], 萃新报.1904-7-26.(1)
- [10] 汪淑潜.新旧问题[J], 青年杂志.1915-9(第1卷第1号).
- [11]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J], 青年杂志.1915-9月(第1卷第1号).
- [12] 杜亚泉新旧思想之折衷[J].东方杂志 1919-9(第16卷第9号);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J]. 1919-10.新潮(第2卷第1号).
- [13]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356.
- [14] 李书城学生之竞争[J].湖北学生界 1903-2(第2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C]第1卷上册.458.
- [15] 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A].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C]第3卷.209-214
- [16] 黄节.黄史·礼俗书第二[J].国粹学报》.1905.(3)
- [17] 邓实.国学无用辨[J].国粹学报.1907.(30)
- [18] 胡逢祥.社会变革与文化传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85-89
- [19] 陈独秀.敬告青年[J].青年杂志.1915-9月.(第1卷第1号).
- [20]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J].新青年 1918-7.(第5卷第1号)
- [21] 常乃惠.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J].国民.1920-10-1.(第2卷第3号)
- [22]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J].新潮.1919-5(第1卷第5号).

- [23] 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J].东方杂志(第 15 卷第 4 号).
- [24] 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A].梁漱溟全集[C].第 1 卷.(611).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 [25] 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J].甲寅.1925-9.(第 1 卷第 9 号).
- [26] 吴宓.论新文化运动[J].学衡.1922-4(第 4 期).
- [27] 张奚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N].国闻周报.(第 12 卷第 23 号)
- [28] 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J].新青年.(第 6 卷第 2 号).
- [29]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A].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
- [30]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J].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8.陈崧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C](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577.
- [31] 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学家之天职[A].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C].
- [32]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A].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C].
- [33] 杜亚泉.亚泉杂志[A].杜亚泉文选[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93.2.
- [34] 王国维.欧罗巴通史[A].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续编[C].1901.
- [35] 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5.
- [36] 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J].科学 1915.(第 1 卷第 1 期).
- [37] 樊炳清.东洋史要[M].东文学社,1900.
- [38] 汪荣宝.史学概论[A].译书汇编[C].1902.(9)
- [39]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A].王国维遗书·观堂别集.(卷四).
- [40] 陈独秀.答皆平[J].新青年.1921.(第 9 卷第 4 号).
- [41]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N].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8;李大钊.史学要论[M].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1980.52.
- [42] 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J]
- [43] 胡适<实验主义>引论[J].新青年 1919-4-15(第 6 卷第 4 号).
- [44]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A].胡适文存三集[C]卷二.
- [45] 傅斯年.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发刊词[J].1927-11-1.(第 1 集第 1 期).
- [46] 傅斯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书[M].史语所刊本.1928.
- [47]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J].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10(第一本第一分册).
- [48] 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J].史学 1930.(第 1 期)
- [49] 严复.群学肄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序)
- [50] 章太炎来简[N].新民丛报.1902.(第 13 号).
- [51] 章太炎.致吴君遂书八[A].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C](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141.
- [52] 麦仲华译.人群进化论[M].上海:广智书局,1903.3
- [53] 李璜.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J].东方杂志.1926-10.(第 23 卷第 20 号).
- [54] 朱希祖.新史学中译本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
- [55] 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A](1929 年 12 月 17 日).民国史料丛刊·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C](第 3 册).台北:传记文学社.1972 年影印本。
- [56] 徐珏清.谈谈历史[J].燕大月刊(第 4 卷第 2 期).1929-4.
- [57] 熊十力.读经示要[M](卷二).上海:正中书局,1949.
- [58] 陈训慈.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J].史地学报.1921-11.(第 1 卷第 1 号)
- [59]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绪论[A].何炳松文集[C].(第 4 卷).12、15.
- [60] 吴宓译.白璧德之人文主义[J].学衡.1923-7(第 19)
- [61] 刘揆黎.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A].古史辨[C](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64.
- [62]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A].古史辨[C](第一册).194、196.
- [63]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弁言[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 [64] 陈训慈.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J].
- [65]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绪论.
- [66]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A].汤用彤全集[C](第 1 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655.
- [67]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A].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279-280。

- [68] 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A].金明馆丛稿初编[C].
- [69] 柳诒徵.国史要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99、124.
- [70] 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A].胡适文存[C](第二集第二卷).
- [71]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 [7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C].北京:中华书局,1932.30.
- [73]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8册)3868-3869.
- [74]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A].饮冰室合集·文集.[C](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32.
- [75] 国粹学报[J].1905.(第1期).
- [76] 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A].汤志钧、陈祖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128.
- [77] 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A].中国近代学制史料[C](第2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560、570-571.
- [78] 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A].静庵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C](第3册)651、644、648.
- [79]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M](第3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1、3-5.
- [80] 奏定大学堂章程[A].中国近代学制史料[C](第2辑上册).779-780、785.
- [81] 1913年1月12日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A].中国近代学制史料[C](第3辑下册),5.
- [82] 朱希祖.新史学[M].(中译本序).
- [83] 胡适.致毛子水[J].新潮(2卷1期),1919.
- [84] 齐思和.论史学之价值[J].燕大月刊(卷七第1-2期合刊),1930-12.
- [85] 衡如.新历史之精神[J].东方杂志(第19卷第11号),1922-6.
- [86] 史地学报[J](1卷2号),1922-5.
- [87] 缪凤林.历史与哲学[J].史地学报(1卷1期),1921-11.
- [88] 李大钊.史学要论[M].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1980年印本,42.
- [89] 史地学报[J](1卷1期).1921-11.
- [90] 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7.31.
- [91] 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规则说明书[J].史学.1930.(第1期)
- [92] 清华周刊[J](第360期).1925-10-20.
- [93] 梁启超.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J].史地学报.(2卷1期),1922.
- [94]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胜利出版公司,1947.85.
- [95] 陆惟昭.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商例[J].史地学报(第1卷第3期),1921.
- [96] 张裕卿.历史科的教学法[J].中华教育界.(第10卷第9期).
- [97] 蒋梦麟.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J].教育杂志.(10卷1期),1918-1.
- [98] 中华教育界[J].1914-6.
- [99] 教育杂志[J].1925(17卷第2-3期).
- [100] 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分组会议记录[J].新教育(4卷3期),1922.
- [101] 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本、预科改定课程一览[N].教育公报.(第14期),1917-10-30.
- [102] 清华一览·研究院章程[J].清华周刊(第360期),1925-10-20.
- [103] 国立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统计表[A].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C](第三册),台北:传记文学社1972年影印本.
- [104] 国立中山大学历届毕业生名录[A].黄福庄.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C],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6),1988.
- [105] 清华大学校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06] 新教育(3卷4期),1921.
- [107] 国立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大事年表[A].学府纪闻——国立北京大学[C].台北:南京出版公司,1981.
- [108] 中国近代最早的史学会——湖北史学会初考[J].近代史研究1986.(6)

注释:

1.此理学包括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地质、博物、生物、人类、动物、植物、哲学、论

- 理、心理、伦理诸学。见《日本书目志》卷二“理学门”。
- 2.关于“科学”概念在国内的传播及其含义的变化过程，详情请参见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和《“科学”概念与〈科学〉杂志》等文。
- 3.见吴宓为胡先骕译《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说》所作按语，《学衡》第3期，1922年3月。
- 4.柳诒徵抗战后期所作之《国史要义》称“故吾人治中国史，仍宜就中国圣哲推求人群之原理，以求史事之公例”，似指历史规律，然细察其意，含义仍近于二十世纪初梁启超依据进化论所提出之“公理公例”，至于社会进化之内容，亦多不出疆域、种族、物产、文艺等演变。参见《国史要义》“史识第六”、“史化第十”等，北京：中华书局1948年版。
- 5.关于晚清至民国初年学科体制的变迁情况，台湾东吴大学的刘龙心博士有较深入的研讨，详可参阅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第四编“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 6.见《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年册》所载文科大学中国史学门课程表，实施于1917年下半年。
- 7.详情可参见《北京大学日报》1917年12月2日刊《改订文科课程会议纪事》及《教育公报》1917年第14期载《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本、预科改定课程一览表》。
- 8.参见《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规则说明书》。
- 9.该所前身是1928年正式成立的语言历史研究所，1931年改称文史研究所，并于次年夏开始招收研究生。
- 10.中华教育的进社系由实际教育调查会、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编辑社等于1921年12月合并组成；四十多个单位加入。次年发展到115个单位，社员217人。该社通过年会等方式，召集社员聚会并分析教育实况，讨论教育问题及各科的教学实施方法等。
- 11.关于中华教育改进社历年年会历史教学组的讨论内容及情况，1922年以后的《新教育》杂志均有详细报道，可参看。
- 12.此据朱有瓚《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下第90-95页所载《历届本科毕业生统计表》。1912年10月，章太炎、马良、梁启超等有发起建立“函夏考文苑”之议，拟仿法国，开设研究院，下设各种研究所，以“作新旧学”、“奖励著作”。马良之《函夏考文苑议》刊于1913年1月26日、2月2日、2月16日天津《广益录》。然并未真正实现。
- 13.1912年10月，章太炎、马良、梁启超等有发起建立“函夏考文苑”之议，拟仿法国，开设研究院，下设各种研究所，以“作新旧学”、“奖励著作”。马良之《函夏考文苑议》刊于1913年1月26日、2月2日、2月16日天津《广益录》。然并未真正实现。
- 14.该所1927年更名为国学研究馆、次年改称国学研究所，1932年改为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
- 15.该会1927年成立后，一年后一度解散，至1928年秋复成立，时有会员二十余人。
- 16.《北平晨报》1932年10月27日载：北平史学会系由平地各大学史学系教授及学生所发起，经二月之筹备，业于昨日借中山公园水榭，开成立大会，到会史学界闻人及各校学生约共百余人。第一次执行会议在北海公园王龙亭开会，主席谭其骧，记录朱士嘉。（转引自《读书月刊》，1932年2月2日）

## On the Approach to Construction of Modern Humanities

Hu Fengxiang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Modern Thought and Culture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 there has been an uneven transformation of humanities in Chinese academic from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 to modern one.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the keen debate over theme of academic modernization has led to articulations of various contesting ideas and schemes, which remains its impact on the present.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e course of transformation

in genera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as a modern discipline of humanities in particular. By doing do, the paper is to find out some attributes of this transformation and evaluate its success and failure in practice. This may hopefully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humanities.

**Key Words:**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Humanities, Scientific Standard, Operational Mechanism

收稿日期:2003-08

作者简介:胡逢祥,男,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